

汉魏六朝荆州地区的 经济与社会变迁

王玲著



六朝时期是荆州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如果沿着汉代统一政权下的发展道路，荆州地区发展的步伐或许要小得多，文化上亦难有如此成就，是分裂与政治斗争为之提供了，非正常的发展机会。正是借由这一机会，荆州地区奏响了前进的进行曲，迈开了发展的步伐，虽然有些步履蹒跚，磕磕绊绊，自此，开启了南方地区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

中南经济史研究文库

汉魏六朝荆州地区的 经济与社会变迁

王玲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魏六朝荆州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王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04 - 8679 - 4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荆州—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②社会变迁—研究—荆州—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F129.963.2
②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318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刘娟

封面设计 杨蕾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插页 2

印张 18.5

印数 1—6000 册

字数 299 千字

定价 36.00 元

引 论

荆州古为九州之一，《禹贡》曰，“荆及衡阳为荆州”，其域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春秋及战国并为楚地。秦兼天下分置郡县，自汉水以北置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巫中地为黔中郡，灭楚之后分黔中置长沙郡。汉高祖分长沙置桂阳郡，改黔中为武陵郡，分南郡为江夏郡。汉武帝又分长沙为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旧名为荆州，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七郡。汉末，增置章陵郡，故刘表牧荆州，谋士蒯越以为，“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①。此之谓也。魏晋时期，荆州之名南北双立。建安十三年，曹操得荆州，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赤壁战后，荆州之域三分于魏、蜀、吴，蜀亡之后，其地归吴所有，其时吴之荆州统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门、长沙、零陵、桂阳、衡阳、湘东、邵陵、临贺、始兴、始安十五郡，魏之荆州统南阳、江夏、襄阳、南乡、魏兴、新城、上庸七郡。晋武帝平吴之后，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立义阳郡，改南乡为顺阳郡，又以始兴、始安、临贺三郡属广州，以扬州之安成郡来属，荆州统郡二十二^②。

东晋南朝时期，因流民大量进入荆州，侨郡县设在荆域者倍多他域，且废置不常，以致名实混淆，“地理差错，其详难举”^③。江左政权为政治军事之计对荆州时有分割，辖区亦随之时有变动，如湘州、江州、郢州先后分荆州而立^④。湘州之设始于西晋，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

①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

② 《晋书》卷十五《地理下》。

③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一》。

④ 据《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载：“郢州刺史，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其年罢并荆，非今地。吴又立郢州。”

陵、零陵、营阳、建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自晋至刘宋曾四度省废，至宋孝武帝正式确立。晋末又分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入江州，宋时在荆、湘两州之间又增设郢州，主要分割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以及南郡之州陵、监利两县而立^①。经此分割之后，荆州辖域从宋初的三十一郡减少至十二郡，其时雍州领十七郡，湘州领十郡，郢州领六郡^②。齐梁荆州境域大致与宋同，梁亡之后，西魏攻占江陵，雍州尽入于魏，荆州长江以北界亦为魏所有，唯江南之荆州与湘州归陈所有。

荆州辖域最大时基本与今天的长江中游地区相合，最小时唯今天湖北的一部分。本书所论之荆州则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邓塞”^③，所涵盖区域即今天的汉水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包括湖北、湖南全部以及江西、河南南阳一部分。行文中涉及的雍州、郢州、湘州虽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单位，但基本都在本书所论的荆州范围之内。

随着荆州区的变化及政治形势之变，荆州刺史治所亦多变动，据《宋书·州郡三》：“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魏、晋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复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自王忱后，江陵作为荆州政治中心的地位再未改变。

对荆州经济发展状况较早的记载来自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言：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晷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的描述大体上可以反映西汉时荆州的经济状况。从上文记载看，此时的荆州并未成为堪为史家称道的独立经济单位，当铁制农具在中

① 天门郡后还荆州。

② 《宋书》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州郡志》。

③ 《宋书》卷六十六卷末“史臣曰”。

原大地上尽情挥舞并产生了发达的农业文明时,荆州地区依然保持着原初的状态:苍郁的森林、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成群的虎狼以及稀少的人群。这几乎是一片沉睡的土地,“地薄,寡于积聚”,生产力是低下的,生活是简单的,生命也是短暂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里基本上不需要商品交换,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别。在这片广大的区域里,经济稍有发展的唯有离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地区——黄河流域最近的南阳,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皆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西汉在南阳设有铁官专司冶铸之事,所铸造的铁农具不仅用于本地的农业生产,还行销至陕西、江西乃至新疆等地^①。在冶铁部门中产生了名闻全国的大商人,积累了巨大的商业资本^②。南阳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飞快的发展^③。南阳的宛城为全国五大都会之一^④,人口繁盛。繁荣的经济使得南阳成为刘秀创设东汉政权的基地,为其政权兴起打下了基础。

东汉时期,荆州的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建武五年,光武帝派张纯“将颍川突骑安集荆、徐、扬部,督委输”^⑤,安帝“永初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樊准建议,“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⑥。尤具意味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安帝时期,永初七年,“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于是调零陵、桂阳等郡租米赈济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⑦。这是荆州稻米的首次外调,不论外调的数量有多少,它都反映出荆州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发展。

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许多渠道产生,在传统社会里,人口的增长往往会带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因而,人口的变化往往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

① 刘太祥《试析河南汉代经济繁荣的原因》,《南都学坛》1999年第1期。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

③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载 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阨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亦言:“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

④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五都”为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

⑤ 《后汉书》卷三十五《张纯传》。

⑥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准传》。

⑦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况。西汉至东汉时期，荆州各郡的人口皆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西汉元始二年，荆州人口数占全国诸州总数的比例为 6.24%，至东汉永和五年，其比例已上升至 13.08%，140 年时间增长了近 7 个百分点。从人口密度来讲，南阳郡、桂阳郡、零陵郡、长沙郡增长超过 5 个百分点，其他南郡、江夏郡、武陵郡的增长在 0.2—0.6 个百分点之间^①。人口增长速度与密度的差异反映出荆州经济发展存在地区性差异，各郡经济发展不平衡。某个地区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和相当速度的增殖，既是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又是考察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一般而言，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人口越多、密度越大的地区往往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区人口状况的差异实际上可代表着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因而，尽管东汉荆州经济较西汉已有发展，但若与同时期的北方地区相比，其差距仍相当大，这同样可从人口上反映出来。以人口密度做比较，东汉永和五年，安平郡人口密度为 225.9 人/平方公里，任城郡为 184.4 人/平方公里，清河郡为 169.0 人/平方公里，其时荆州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南阳郡人口密度也不过 48.8 人/平方公里，最少的武陵郡仅有 2.2 人/平方公里^②。因而，尽管与西汉相比，东汉荆州的人口总数有了很大发展，但“地广人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很大改观。正因为此，东汉人班固眼中的荆州与西汉人司马迁眼中的荆州并无明显差异：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甞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③

与其他各州相比，荆州地区的经济依然是相对落后的。

造成两汉荆州地区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很多。从客观因素而言，环境“卑湿”、“厥土惟泥”、人口的稀少皆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从主观因素而言，统治者往往重视支撑其统治的基本经济区的发展，而对其他地区的经

① 参见附表一。

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③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济缺乏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① 在两汉大一统社会里，长安及洛阳先后成为首都，政治中心位于黄河流域，为其统治提供经济支撑的基本经济区亦位于北方。“虽然西汉着重发展关中，而东汉则更多地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河内，但是，包括泾水、渭水和汾水流域，以及黄河的河南—河北部分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却构成了一个基本经济区，这一基本经济区，是从公元前 206 年到公元 220 年整个两汉时期的主要供应基地和政权所在地。”^② 因而，首都、京畿地区、地方重镇及交通要道附近地区受到中央政权的特殊重视，在经济上有着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偏离基本经济区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受到冷落。以东汉为例，东汉定都洛阳，其时经济发展状况最好、人口最为密集的几个地区分别是河内郡，洛阳北一百二十里；河东郡，洛阳西北五百里；弘农郡，洛阳西南四百五十里；左冯翊，洛阳西六百八十八里^③；颍川郡，洛阳东南五百里；汝南郡，洛阳东南六百五十里；陈留郡，洛阳东五百三十里^④。郡治距离洛阳皆未超过七百里，大致都位于基本经济区内。而荆州地区，最北部的南阳郡距洛阳七百里；南郡，洛阳南一千五百里；江夏郡，洛阳南一千五百里，桂阳郡等地则更远。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的丹阳郡，洛阳东二千一百六十里；会稽郡，洛阳东三千八百里；吴郡，洛阳东三千二百里^⑤。偏离基本经济区，加之集权体制下掘地方以注中央的经济模式及内敛效应，使得距中央较为偏远的地区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投入，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而汉代荆州地区经济难有大的发展^⑥。

汉末至六朝，包括荆州地区在内的南方地区赢得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①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 页。

② 同上书，第 78 页。

③ 《后汉书·郡国一》。

④ 《后汉书·郡国二》。

⑤ 《后汉书·郡国四》。

⑥ 东汉时荆州地区南阳郡的经济堪称发达，其原因不仅在于南阳在地理上密近京师，主要在于南阳为“帝乡”，且多功臣宿旧，在政治上享有极高地位，因而在经济发展上也极受重视，享受到许多优待，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南阳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建。

要机会。这一时期的政治大分裂为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命运。对于北方地区来说,自东汉统一局面丧失之后,便陷入了持久的动荡,军阀割据混战、三国争霸之斗、八王之乱、胡汉相屠、羌胡互攻,几乎无日不战,无月不争。频频燃起的战火使北方经济遭受到巨大的摧残与破坏,汉末董卓乱后,“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①。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生民道尽”^②,“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殍,相继沟壑”^③。十六国时期的混战较之前代对经济的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北朝对峙时期,虽然北方经济略有好转,但南北相伐以及北朝政权更迭造成的混乱依然破坏着经济的发展。在这四百年中,北方经济也曾有过几次恢复,如曹魏时期“百姓勤农,家家丰实”^④,前秦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⑤,北魏时“百姓殷阜,年登俗乐”^⑥。但这间断的发展无法彻底医治战乱给北方经济带来的创伤,与东汉相比,北方经济无疑倒退了一大步。而对南方地区来说,社会大分裂的政治局面却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随着统一局面的丧失,政治中心从一元转为了多元,支撑多元政治中心局面存在的是几个对立竞争的经济区,如蜀之长江上游、吴之长江中下游、魏之黄河流域。为了保证各自统治的存在,各政权皆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在北方动乱的推动下,在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吸引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构成南方经济开发的一个因素”^⑦。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南方经济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对于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学界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许多学者高度肯定了该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成就,并由此展开了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讨论。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是完成于六朝还是开始于六朝,抑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③ 《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传》。

④ 《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

⑤ 《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

⑥ 《洛阳伽蓝记》卷四。

⑦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0页。

或把六朝作为经济重心南移的准备阶段,学者们各抒己见,未有共识^①。但是,不管哪种意见,都承认六朝时南方农业、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南方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南北经济的相对地位也有一定的变化。然而,若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学者们对六朝南方经济的研究往往集中于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而对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要么忽略不论,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诚然,六朝时荆州与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如扬州突出,成就也逊色得多,然逊色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六朝时期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都有发展,只是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而已。评价南方经济是否超越北方,南方是否取代北方而成为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必须对包括长江中游在内的南方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考察方可避免以偏概全之弊病,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六朝时期,位处长江中游的荆州与长江下游的扬州并列为两大方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然两者对于六朝政权的意义却不尽相同。“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轂于荆楚”^②,扬州为政权提供经济支持,“谷帛所资皆出焉”;荆州则为政权提供军事防护,“甲兵所聚尽在焉”^③。正因为六朝时期荆州的军事重镇地位太过显赫,使得人们容易忽视政治、军事风云之下荆州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特点也反映在学术界对六朝荆州地区的研究上,学者们更多地从政治层面去研究荆州而很少从经济层面予以考察^④。目前,随着区域经济研究视界的不断扩大,学术界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与经济越来越重视,汉魏六朝是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

① 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学术界讨论很多,分歧也很大,仅经济重心南移的开始时间就有战国说、东汉说、魏晋南北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中唐或安史之乱说。何时完成也有魏晋南北朝说、隋代说、隋唐说、唐代说、唐代后期说、五代说、北宋说、北宋晚期说、南宋说。详细情况可参见程民生《关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与思考》,《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

② 《宋书》卷六十六卷本“史臣曰”。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宋纪十》“孝建元年”。

④ 对于六朝荆州地区经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论文集《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及《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李文澜《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相关章节以及黎虎、黄惠贤、贺忠者、杨德炳、袁纯富、陈国灿等人的论文。这些成果涉及人口、土地的垦辟、水利的兴修、稻作农业、蛮族在长江中游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屯田等各个方面。

起点,研究长江中游经济的发展变化,梳理其发展脉络,寻求经济变迁之原因,展现其发展规律与特点,为长江中游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必然无法回避汉魏六朝这一重要时期,因此,这一时期荆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应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学术、宗教、艺术、民俗等总是表现出共同的区域特征,形成一个文化的区域综合体^①,此即是文化区域。而文化发达区域是以各种文化要素,如出书的多少、士人的分布、教育情况的差异、士人出身的职官的数量等分项统计作基础,再相叠加而划定的。文化因素的密集分布区就是文化发达区域^②。文化发达区域往往并不是唯一的,如东汉时颍川、汝南、南阳皆可称为文化发达区域。文化发达区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些条件之下,旧的文化发达区域会走向衰落,新的文化发达区域又会产生,东汉末年关中文化区的衰落与益州、江东文化区的兴盛则是显例。而当我们视线投注于某一个区域内部,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里也有一个地区的文化较之其他地区的文化要发达、繁盛,本书也称之为文化发达区域,只是这个区域相对全国的文化发达区域来说它所包含的地理单位相对较小。

区域文化的发达与否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六朝包括荆州在内的南方文化的发展,唐人曾归因于如下四点^③:一是北方政权南移。二是大量衣冠学者的南迁。“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甚。”^④三是藩镇所寄。“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陆,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⑤四是儒雅时主的倡导。“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⑥

①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②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③ 牟发松在《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对此有过论述。

④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典》。

⑤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

⑥ 《南史》卷七十二《文学列传》。

诚然,唐人所论皆是六朝荆州文化发展的背景所在,然而却忽视了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变迁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学风的形成、学风的浓淡及其地域分布的格局,决定于一系列相互交错的复杂因素的综合”,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历史、风俗习尚等皆可制约并影响文化的发展。“就单项因素逐一而论,经济发达的程度似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不仅因其物质条件优裕,而且社会相对安定,有利于学术文化的繁荣。”^①文化是在经济土壤上绽放的精神之花^②,经济既为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也为文化提供形式与内容。因此,伴随汉末六朝荆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变迁,其文化也随之发展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点^③。

本书借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施坚雅“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概念与理论,以正史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应用历史学、区域经济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考察汉魏六朝时期荆州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历史变迁,剖析一个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经济与社会变

① 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② 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包括物质生产、社会组织、精神生活、科学技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人类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的各种活动,狭义文化则指与特定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即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组织,包括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艺术,等等。本书探讨的主要是狭义的文化。

③ 对于汉魏六朝荆州文化的发展,学术界不乏研究,不过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于荆州学派与佛教的传播。相关的代表性成果有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玉堂《刘表与汉末荆州学术文化》(《江汉论坛》2001年第4期)、王晓毅《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唐春生《刘表时期避难荆州的北方名士》(《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张运华《荆州之学与魏晋玄学》(《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金仁义《刘表与荆州学派》(《池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郝虹《王肃〈周易注〉、王弼〈周易注〉与荆州学派关系初探》(《大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张伟然《湖北省境东晋南北朝的佛教传输与学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1992年第1期)、夏日新·《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谷川道雄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本玄文社1988年版)等,一些著作中的有关章节对这两个问题也有涉及,如马良怀、徐华《玄学与长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7年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迁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影响。全书内容分为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

上编四章，探讨汉魏六朝时期在政治中心多元局面下荆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第一章考察荆州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气候、水文、交通、人口，分析资源因素对荆州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二章考察汉魏六朝时期荆州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动、地方发展经济的制度安排，分析政治军事因素及制度因素对荆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第三章考察荆州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汉代的荆州农业、六朝稻作农业、屯田、地主大地产农业；第四章考察城市与工商业的发展变化。

下编三章，通过对荆州区域内部文化中心从南阳向襄阳再向江陵转移的这一过程的考察，探讨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第五章考察东汉南阳文化中心的兴衰，包括大姓家族的兴起与文化之关系、官学与私家教授、南阳儒学的特点及道家思想在上层与民间的涌动；第六章考察汉末至梁朝襄阳文化中心的兴衰，包括汉末的荆州学派、东晋的佛教兴盛、梁朝萧纲集团的文化活动；第七章考察东晋南朝江陵文化中心的兴衰，包括士族迁移与江陵文化的发展、地方州学的发展、地方文化集团的活跃、《西曲歌》的产生与流行、佛教的传播及影响。

目 录

引论.....	1
---------	---

上 编

第一章 生态、交通与人口	3
第一节 荆州地区的生态环境.....	3
第二节 交通运输网络.....	9
第三节 人口的变化	14
第二章 政治局势的变动与地方发展经济的制度安排	25
第一节 荆州地区的政治角逐	25
第二节 荆州的军事扩张与粮食供应危机	34
第三节 地方发展经济的制度安排	39
第三章 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56
第一节 汉代荆州的农业——以出土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56
第二节 六朝荆州稻作农业的发展	68
第三节 屯田与经济开发	78
第四节 地主大地产农业的发展	84
第四章 城市与工商业的发展.....	105
第一节 手工业的发展.....	105
第二节 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112

第三节 商业贸易的繁盛·····	123
------------------	-----

下 编

第五章 东汉的南阳文化·····	135
------------------	-----

第一节 大姓家族竞风流·····	135
第二节 官学与私家教授·····	144
第三节 南阳儒学的炽盛·····	149
第四节 道家思想的涌动·····	153

第六章 汉末至南朝的襄阳文化·····	161
---------------------	-----

第一节 汉末荆州学派·····	161
第二节 东晋襄阳的佛教文化·····	178
第三节 梁朝襄阳文化·····	190
第四节 襄阳文化的衰落·····	197

第七章 东晋南朝的江陵文化·····	203
--------------------	-----

第一节 衣冠之绪入江陵·····	203
第二节 地方州学的发展·····	209
第三节 地方性文化集团的活跃·····	213
第四节 《西曲歌》的产生与流行·····	227
第五节 江陵佛教的发展·····	236

结语·····	248
---------	-----

附录·····	258
---------	-----

主要参考文献·····	268
-------------	-----

后记·····	279
---------	-----

上 编

